

論《文心雕龍·雜文》篇的“對問”體*

李政林**

目 录

- 一、引言
- 二、“對問”體之命名
- 三、“對問”體之淵源
- 四、“對問”體之發展
- 五、“對問”體之內容特質
- 六、结语

一、引言

本文將討論的所謂“對問”體，其文體類型所指涉之範疇，取自《文心雕龍·雜文》篇。《文心雕龍·雜文》篇裏主要舉出三種類型，一曰對問，二曰七發，三曰連珠。而云此三體為“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之作。其中論“對問”類：“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自《對問》以後，“迭相祖述”作品陸續出現，如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崔駰《達旨》、張衡《應問》、崔寔《答譏》、蔡邕《釋誨》等。至於此類寫作之法則云：“原夫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嶽其心，麟鳳其采，此立體之大要也。”此類寫作目的主要在發抒憤懣、表達志趣。當身受挫折時，則憑藉修明道德自慰，所遭時世艱困時，則寄託舒泰的心情以俟命。因此其意境必如淵岳之高深，其辭采須資美飾之形容。這就是此類作品之寫作要求。

* 이 논문은 2015년도 호남대학교 학술연구비 지원을 받아 연구되었음.

** 湖南大學校 中國語學科 教授.

《文心雕龍·雜文》篇論述文類，包括多種體裁，其體例與其他論文體諸篇稍異。但關於"對問"類之論述，仍可以依照《序志》篇所云之綱領，探索其文類之特點。劉勰認為"對問"類為具有特殊風格與情致的新文體¹⁾。但若其與《詮賦》篇之論述比較，便可發現兩者之間有基本上的共同點。如"對問"類之寫作目的在於"發憤以表志"，其作品之風格特點或創作準則為"淵岳其心，麟鳳其采"。即其發憤之思，須以高潔之志表達，而其志必藉瑰麗辭采以表現，才能達到此文體風格之要求。如此，"對問"體之創作準則，可以用"賦"體之風格要求—"麗詞雅義"一概括其原則。雖然如此，劉勰似乎又意識到兩者之不能同等看待，尤其特別注意到"對問"體之產生，乃因於首創作者在情辭方面的優異表現，所以云："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故"對問"體與舊有的詩、賦等諸文體不同，其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若從"對問"體與"賦"體之間的基本共性看，"對問"類作品是"賦"體之枝派。因此，劉勰不標文體之名，將此類置於《雜文》篇裡。

凡文學類型之形成，文學創作的產量到達某一種程度時，便會有約定俗成的表達方式、與形式結構，並搭配特定的內容，類型便逐漸產生。準此觀之，"對問"類，其所表達的內容與承襲前人之表達方法的篇章結構等方面，雖然模效的成分極重，但是似乎可以視其為具有特殊類型的文類。

二、"對問"體之命名

"對問"一體，乃為通過問答形式以抒發個人情志的一種文學類型。"對問"之名，本取自宋玉之《對楚王問》之篇題，實據其文章的形式結構命名。《文選》所收錄的宋玉《對楚王問》，《文心雕龍·雜文》篇及《宋玉集》²⁾稱之為

1) 《文心雕龍·雜文篇》云："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

2) 《宋玉集》，為六朝人所編的宋玉的別集。《隋書·經籍志》有"楚大夫《宋玉集》三卷"。隋志著錄的《宋玉集》已失傳，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記載《宋玉集》一

《對問》。宋玉《對楚王問》先以楚襄王責問宋玉之語發端，宋玉就以此對答之形式來表現自己的高潔胸懷。這種實際上是“借題發揮”的表現方式，便成為東方朔《答客難》二下一系列作品的濫觴。但《文選》欲將此類作品分為“對問”與“設論”二體，即以《答客難》、《解嘲》、《答實戰》別為一類而稱之為“設論”體。《文選》另立“設論”體，可能因著眼其假設之辭的特性，至於“對問”體，蕭統或許認為它是記錄實際問答之辭的作品。因此，明人吳訥《文章辨體》云：“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是所謂對問之辭。至若《答客難》……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徐師曾在《文體明辨》亦云：“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后人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問對之文”。吳訥、徐師曾二人將《文選》所區分的“對問”、“設論”合為一體，而稱之曰“對問”體，但說明文類時，仍兩者大有區別：一為前人一時問答之體；二為文人假設之體。漢以後“答客難”一系列的作品，皆以設客難而自己辯解的方式展開作者情志的主現。其辯難過程之中，自然帶著議論之意味，因而班固《漢書·東方朔傳》云：“朔因著論，設客難已”。但畢竟此類作品的撰作目的在於抒發個人情懷，而不在於辨析事理，正如《文心雕龍·雜文》篇所云的“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然而後世有的文體論家便受《文選》類名之影響，將“設論”體歸入於“論辨”類之內，如清吳曾祺《文體芻言》即如此³⁾。然而吳氏所云之“設論”體，亦以包含《對楚王問》及《答客難》一系列的作品在內，並且謂東方朔、揚雄、班固之徒，皆仿《對楚王問》而為之⁴⁾。可見《對楚王問》與《答客難》一系列作品之淵源關係的認定，乃為自《文心雕龍》以來歷代文人

卷云：“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但《文選》李善注中有二處保留有關《對楚王問》之若干片斷，其中卷十八嵇康《琴賦》“紹陵陽，度巴人”句李注引《宋玉集》時，將其篇題稱為《對問》。

- 3) 吳曾祺有文章總集《涵芬樓古今文鈔》，此總集仿《古文辭類纂》體例，加以分別小類。《文體芻言》本為對每一類文體的論述之語，後來附於《涵芬樓文談》之末。但他將“設論”體卻歸屬於“論辨”類之內（見《涵芬樓文談》附錄頁二一三，商務印書館版）。
- 4) 吳曾祺云：“宋玉作《對楚王問》一篇，以抒其遭時不遇之感。其後東方曼倩、揚子雲、班孟堅之徒，皆仿而為之。……今併而為一。”

的一種共識。

《文心雕龍》以"對問"之名概括此文類之性質⁵⁾，後來之總集、選集類大都普遍承繼其分類，而稱此文類為"對問"或"問對"體。如南宋呂祖謙所編的《宋文鑑》、清董兆熊之《南宋文錄錄》、近人張相《古今文綜》都設立了"對問"一體，又如明文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程敏政所編的《明文衡》則稱之為"問對"體⁶⁾。"對問"與"問對"，實質並無二，曾云："設辭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真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對問"之文體，總歸為"設詞以見志"、"舒憤鬱而通意慮"之要旨，《文心雕龍》之立體亦不外乎此。"對問"之體，《文心雕龍》雖以宋玉"楚王對問"為其首創作品，但事實上，文學史中任何首創或獨創作品，都對前代的創作有借鑒之處，繼承與創新是不可分割的兩方面。

三、"對問"體之淵源

(一) 問答體裁文學之淵源與"對問"體

關於"對問"體之淵源，清紀昀評曰："《卜居》、《漁父》已先是對問，但未標對問之明耳⁷⁾。的確，《卜居》、《漁父》皆以二人對話組成，表達作者的思想。然而，此二篇均用"屈原既放"一語開端，似是第三者記敘口吻。本文以一問一答引起敘述，收尾亦不作解答，作者用類似寓言的手法，突顯屈原之遭遇以及堅持廉貞、抗擯時流之崇高形象。如此，《卜居》、《漁父》之作者，在第三者立場敘述，其作品以二人對話推進情節的結構，與《答客難》一系列作品問答結構模式--客又問難而主人辯解，即作者在主人立場展開論旨--其表現

5) 《文心雕龍·雜文》篇："宋玉含才，頓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

6) 此外，尚有稱"問答"體者。如《文苑英華》有"雜文"類中設"問答"之目，清莊仲方《南宋文範》及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則有"答問"類。

7) 見《文心雕龍》黃叔琳注本《雜文》篇。

方式上仍有差別。紀昀之言，只著眼於問答形式上，未能看出“對問”體結構之特性。又如楚辭中《離騷》裡，亦已加雜著許多問答體的句子，其中有女嬃、重華、靈氛、巫咸的四大段對話，雖非正式的一問一答，然實際上是問答的體裁。不過為行文上方便起見，故省去一方的問句或答句，如女嬃勸責屈原之部分：“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弦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學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世並舉而好朋友兮，夫何覺獨而不予聽？’”以這種方法，寫出內心的種種情緒，格外委婉動人。凡問答體或對話體形式，本是古往今來文學最親切的表達方式。但是，設為主客，問難及辯解模式的“對問”體，若從淵源上去探察其特殊問答結構，應可以說與先秦論辯文章中的問答運用之手法的確有關，因此，下面從先秦散文考察“對問”體問答形式之淵源。

（二）先秦散文與“對問”體之淵源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云：“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客難》、《解嘲》，屈原之《漁夫》、《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章氏將“對問”體之淵源推溯之戰國時期的論辯散文。他認為《莊子》書中莊子與惠施之問難，已具備“對問”體之要件。然而，《莊子》書中之問難，實際上大多是當時論辯實況之記錄，即使有假設問難，也只能視為寓言性質。

兩人辯說事理，一問一答的形式，常見於先秦散文中，尤其以記言記事為主的史傳散文及以語錄體、對話體為主的《論語》、《孟子》等書，其問答形式只是說話時的問答，而被記錄流傳的。但戰國中期以後，私家著述中出現有據題抒論的篇章，如《墨子》、《荀子》、《韓非子》的一部分。這些篇章，亦是戰國諸子論辯立論風氣下的產物，因而在其結構形成感修辭技巧上，大抵與談論口辯的說辭關係密切。但其中之問答結構，是為了發揮作者觀點而有意安排，並非僅是談論之記錄。首先舉《墨子》書⁸⁾中的例子，如《兼愛中》篇：

8) 墨子之活動期在孔孟之間，但《墨子》書五十三篇，文體既不一致，成篇自有先後。其中自尚賢至非命二十三篇均採據題抒論體，結構相當嚴密。

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夫愛人者，人必後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後而利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

又如《兼愛下》篇：

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子，且焉然有善而不可用者？故嘗兩而進之，……"

"兼愛"是墨學的根本觀念，上述之問答實例，是為了推廣其學說而假設的。先假設反對派之詰難，然後以答辯形式逐步展開論證其學說的可行性，這種有意識的問答形式，在其結構方面，已於"對問"體之自設辯難形式具有共通性。再舉《荀子》書中的例子，如《性惡》篇：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儀惡生？"應之曰："凡禮儀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問者曰："禮儀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儀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儀……"

荀子主張人性惡，只有經過後天的師法之化，禮儀之導，才能化為善。他藉假設問答，闡發議論，在答辯中逐層說解、辯難。其問答形式的作用，就在展開申述己見，《韓非子》亦有與此類似的問答運用之例，如《問辯》篇：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二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

假設一個人，就"爭辯"一事發問，而韓非借著問難的同時而揭示己見。在一問

一答之中，加以申論，發揮法家的主張。這種問答形式，可說根源於口辯時之問答，但上述《墨子》、《荀子》、《韓非子》中之問答實例，已是有意識的運用問答結構之例子，其目的在於企圖更有效的表達自己的思想，就採取問答形式之效用言，自設實主辯解的方式，能使讀者置于第三者的客觀立場，因而通過問答形式之間接說理，更具有客觀性、說服力，易於讓人信服。“對問”體之問難、辯解的問答結構，可說取法於此。

除此之外，《荀子·宥坐》篇載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的故事，其中孔子答辯子路之問一節的寫法，頗與“對問”體相似，如《宥坐》篇之一段：

子路進問之曰：“由問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父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何獨丘也哉！……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難賢，其能行乎？……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⁹⁾

再看東方朔《答客難》一文，如：

客難東方朔曰：“……今子大夫，修先生之術，慕聖人之義……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這尚有遺行邪？……”東方朔先生涓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事。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苟能修身，何患不榮？……”

兩文的問答結構、布局及“雖人不遇時，但不敢怠修身”的思想與設辭等，極為相似。

總言之，具有特殊問答結構——問難、辯解——的“對問”體之問答形式，應有所本，而在先秦散文中可以找到其文體之淵源。從上述例證之中，可見“對問”體之

9) 唐楊炯於《宥坐》篇目之下注云：“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此引孔子與子路之對問一節，並見於《韓詩外傳》卷七及《說苑·雜言》篇，但文字互有出入。蓋《韓詩外傳》出自《荀子》，而《說苑》出自《韓詩外傳》。

創作頗受先秦散文之影響。

四、"對問"體之發展

(一)《對楚王問》與《答客難》之關係

《文心雕龍·雜文》篇謂宋玉"始早對問",但是"對問"之名,至六朝才出現,宋玉之作,原本並無篇題,況且劉向《新序》把它當作軼聞記載,所以,更不能說宋玉有意創造一種新文體。"對問"體之形成,應是東方朔《答客難》以後之事,漢代"對問"體之作品,大都承襲《答客難》之內容意旨及其結構形式,加上大一統帝國之時代環境因素,形成了具有獨特風格的一種文體。然而,《文心雕龍·雜文》篇云:"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答客難》的確在其作品構思、自我辯解的表現方式方面,都有從《對楚王問》取法的痕跡。

《對楚王問》以楚襄王文問話發端,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然後宋玉以答復形式表達一個具有高潔品格的知識份子,如何不為俗世所知所榮。此作品因開頭有"楚襄王問於宋玉曰"云云之語,似是第三者的口吻,而近人多疑為后人記敘之文¹⁰⁾,但無論其作者為誰,此作品應與宋玉之言行有關,若再其宋玉之答話與其他傳為宋玉之作品或傳記資料配合看,便能窺知宋玉此談話之用意。首先看有關宋玉在當時所處之地位的記載,如: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新序·雜事第五》)可知宋玉在當時地位確實不高,也不受重用,又從《文選》所載賦作品中的記敘,如"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風賦》)及《高唐賦》、《神女賦》等,亦可以看出,宋玉不過是一個文學侍從之臣,作品中所談的只屬於平居游樂之事,顯然被楚王看待為一種弄臣而已。然而,從《九辯》之內容看,宋玉似乎很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是由於君主昏庸("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而取路"),小人當道("猛太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他反而被罷黜("貧士失職而志

10) 參見陸侃如《宋玉評傳》收於鄭振鐸編《中國文學研究》。

不平”。他失職後，仍然請求君主自省，以堯舜、齊桓公為榜樣（“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他認為國家安危的關鍵在於舉任賢士，而自己也期望一心效忠君主，但終不得志（紛純純之顧忠兮，妒被離而鄣之）。由上觀之，《對楚王問》之談話，便暗示著宋玉在當時朝廷中受到排斥的情形，而宋玉對此的辯解，其實是針對不識人才的楚襄王而言的，可以說是一種諷喻。

宋玉在《對楚王問》中的表現方式，並不直接為自己辯解，而采取迂回的方式，皆用例舉比喻的手法，如“下里、巴人”、“陽阿、薜露”、“陽春、白雪”、“印商刻羽，雜以流徵”等曲調高深的程度來比識見的高下，又以“鳳”、“鯢”與“鷓”、“鮠”比喻“聖人”與“世俗之民”，如此通過鮮明的對照，最后借“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之語，表明自己的高尚情操。

東方朔《答客難》之撰作，是為了抒解對自己不受重用的感慨。東方朔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博聞辨智”，但他始終處於“主上所戲弄，流俗所輕”¹¹⁾的文學侍從之地位。而他辯解自己不得志之故，雖托辭於“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的時事差異，但仍含有不為君主所賞識的質疑（“賢不肖何以異哉？”）。《答客難》的表現方式，亦效法《對楚王問》之從容不迫的辯解方式，均用古今局勢及人物之對比說明當代士人之不遇處境，東方朔藉此表明自己不見重用而不怨，闇然自修，表面上都不露不滿之意，呈現自己心胸豁然。可見從問答之結構及作者在答話中之用意至其表現方式，《答客難》都有承襲《對楚王問》之處。

不過，《答客難》一開頭就舉蘇秦、張儀對比作者之位卑，這表示作者非常嚮往士人受到尊重的戰國時代（“蘇秦、張儀之時……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進而指出“今則不然……天下平均，合為一家……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有賢者無所立功”，說明戰國縱橫之士與大一統時代文士處境的差異，歸其本於時勢不同。《答客難》所提出的，不僅是如《對楚王問》所表明的人格、處世的問題，而更是在中央集權專制的新政治制度下士人普遍感

11) 司馬遷《報任安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受到的問題，加上《答客難》運用鮮明的對比、貼切的比喻，能夠引起漢代士人之共鳴，於是《答客難》就成為后人所摹擬的對象。

（二）西漢以來之模擬文風與“對問”體之發展

漢代文學以賦體為其主流，而有騷體賦與散體賦之別。在兩漢賦文學發展過程中，引人注目的現象，即其體裁一定型，以後作品就走模擬之路。首先就騷體賦而言，因楚辭已盛於屈宋，至漢代便進入模擬時期。漢代文壇，凡抒發個人情感，特別是哀怨憂憤之情的作品，多採用騷體的形式，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因為‘騷則常於言由原之情’¹²⁾，而且楚辭為漢初諸帝王所喜好，並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文人熟讀且有意運用楚辭具有抒發悲憤之情的特點。而其模擬楚辭之風，最顯著的莫過於王逸《楚辭章句》所收的作品，其寫作多以‘傷愍屈原’¹³⁾為旨歸，以代言形式寫擬騷之作。漢代作家們難以屈原之‘怨’，象徵著自身的‘怨’，但其作品形式的规范化，乃至題材、主題的定型化，在內容與形式上一意仿襲前人，竟成為一代的風氣。至於散體賦，其形式格調，為司馬相如所建立定型，由於典型已具，繼起的作者，難越出其範圍，不得不因循前作¹⁴⁾，致模擬成風。就文學本身而言，模擬可以說是文學演進過程中之一現象，即後繼者難於其中再出新意，而未能另辟蹊徑的情況，便是模擬舊篇。

至於“對問”體之形成，乃為因擬作者眾多而成為一種文類之例。西漢末揚雄好模擬古人，他仿效東方朔《答客難》而作的《解嘲》，亦是“對問”體形成之關鍵性的作品。《漢書·揚雄傳》云：“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當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

12) 程廷祚《騷賦論上》（華正書局版《中國歷代文論選》上冊，頁110）。

13) 王逸《楚辭章句·九思》序：“讀楚辭而傷愍屈原，故為之作解。”

14) 如宋洪邁《容齋五筆》卷七云：“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實、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

時則龍蛇，過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又桓譚《新論·道賦》篇載：“子云曰‘能讀千賦則善賦’”。以上引文包含著揚雄之創作模式以及他的人生觀。《解嘲》之作，完全模仿《答客難》的構架，依然通過古今之士的不同遭遇的對比，以決定自己的應世方式，但到揚雄的時代，士之不遇已成定局，習以為常，也就比較冷靜。《漢書·揚雄傳》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這是揚雄寫作的最直接的動機。引文中之“丁”為哀帝母之兄一大司馬丁明，而“傅”則指哀帝皇后傅氏之父一孔鄉侯傅晏，董賢為哀的所寵“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表露當時宦海沉浮之情形，又云：“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指出世人無所書展其他抱負的處境。揚雄特別洞察到當時掌權者的聲勢很難持久，他說：“且吾聞之，言言者滅，鬼瞰其室，攫者亡，默默者存，未及者宗危，自守者身全。”因此，他甘於“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由此可見，揚雄做“解嘲”，其在構思形式上雖模仿《答客難》，但對當時現狀實有感而作，而且更有深刻的認識。《答客難》重在生不逢時的感慨，《解嘲》，則重再現實政治條件之下，士人如何抉擇自己的進退，揚雄《解嘲》云：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不可為之時，則凶。他自己則默然獨守吾《太玄》，自甘淡薄埋頭著述。揚雄觀察事態人情，深刻細密，《解嘲》於是同《答客難》，歷來所傳誦，為後人所模仿。正如宋洪邁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上有馳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接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容齋隨筆》卷七）

對問之成為一種文體，蓋在東漢明帝、章帝之時，這時文士創作中模擬之風更盛，而班固《答賓戲》、崔邕《達旨》等均為模擬《答客難》、《解嘲》之作品，史書本傳各載其撰作動機，如：

班固〈答賓戲〉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漢書》》卷一百敘傳)

崔駰〈達旨〉

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後漢書》》卷二十五本傳)

他們有意且公然模擬前作，而且其撰作動機、結構形式及表現題材亦大體相似，因而以後作家將它們看作一種專體，襲其體裁而寫作，如《後漢書·蔡邕傳》為蔡邕作《《釋誨》》之情形云：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已戒厲。於是，假設客主問答，而由客所提出的，皆關係於主人的出處進退問題，然後由主人雄辯地辯解自己得際遇以及其處世方式的合理性，其議論多方徵引，反覆譬解，頗具有說服力—如此的結構與內容，便是〈答客難〉一系列作品的共通特點，而就構成一種特殊的文學類型—對問體。

五、“對問”體之內容特質

如前所說，“對問”體為借客主問答形式以表達個人情志的一種，而其主題皆環繞著政治現實與士人出處的問題。漢代“對問”體作家對其時代之認識，基本上通過戰國與漢代之“時異事異”的對比架構，確認當前之局勢。在此時代環境之下，士人該如何對應才能存在的尊嚴？這是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因此，在作品中一方面辯解自己不獲進用之故，同時尋求合理的處世之道，以致表明自己哲學人生觀。此即《答客難》一系作品的寫作模式，以下就“時異事異”之體認及對時代俗風氣之批判及尋思自處之道，逐次探察漢代“對問”體

作品之內容特點。

(一) “時異事異”之體認

“對問”體問答結構中的問題，皆與士人任途有關。其問雖在作品裡代表一般時俗之觀點，但實際上透露著知識份子本有的用世抱負在現實政治的重壓之下無法施展的情形，而作者對其理想與現實之不相應，從理性的時勢分析中，試圖說解其間的凝結。

東方朔《答客難》首先從“時異事異”之歷史體認，說明漢代士人與前代士人不同遭遇的情形。《答客難》云：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持戟，…其何故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

東方朔假客設難，在開頭提到自己位卑，與蘇秦、張儀對比，就是為了突顯兩個不同局勢下士人所遭遇之不同。而籍此說明在漢代一統政局下，為帝王者，“動發舉事，猶運之掌”，反而士人已無主動的活動空間。因此，士人不得志，其關鍵並不是在於士人的本身，而在於時局的形勢。如此，作者理智的局勢，而體認當前的現實政治之實況。但就以“天下”為自任的知識分子而言，這莫非是一種無奈的體認，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的對比，始終給漢代士人，藉此省思漢帝國之政治形態與，士人出處的問題。

揚雄《解嘲》，仍以“時異事異”之架構，展開論點，《解嘲》中云：

客嘲楊子曰：“…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曆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一從一橫，論者莫當…位不過侍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微以糾墨，制以鑽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夫上世之士…

…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訕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捲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此文前段“客嘲”之辭，依然以戰國士人之活動（“一從一衡，論者莫當”）情形嘲作者官位之卑微。而其答辭中指出當今之世於戰國之士人受重視的時代，上世之士能毫不退縮的發揮他們的議論，而當今之士欲“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足而投迹”。揚雄對士人處境的分析，雖基於當前的現實狀況，但對其一統專制的根源上的體認，亦與東方朔不無二致。

至東漢，班固《答賓戲》、崔駰《達旨》依然沿用古今之對比，但此時的士人，隨時間之流逝，對一統專制之政治實體，普遍採取妥協態度，並為之作合理化的說明。如《答賓戲》：

賓戲主人曰：“…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曾之計，使存有頭號，亡有美溢，不亦乎？”主人而笑曰：“若實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於是七雄城闕，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力皆能一斷……。方金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其君子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酥，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觀，……亦未至也。

主人之答辯依據，仍是時異事異之體認，但班固極稱漢室之德，他認為處於

漢室之時勢，士人應沐浴玄德，稟仰太皞。他承認漢家大統一專制的絕對權威，因而，將士人活動類比於自然界，為各得其所，各得其宜，沒有人事厚薄可言。至此，並無東方朔、揚雄之反諷意味，可見班固對漢室權威之認同。然而，在實際政治環境中的黑暗面，對知識分子而言，在進退之抉擇上有決定性的作用。尤其東漢和帝以後，外戚、宦官之擅權及衝突，造成政治之敗壞，於是仕途也更為危險，士人內心所爭執的，已非遇不遇、生不逢世的感受，而是在現實世界中價值取舍之問題，如張衡《應問》：

有問余者曰：“……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剋，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勤，雪前吝，婢恨不柔，以意誰斬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求之無益。……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當此之曾，乃鼙鳴而鼙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而不暇，尚何功之可立？……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據，失途者幽僻，遭遇難要，偶為倖，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幹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此文亦通過戰國、漢室之時局與人事的對比，戰國士人相應君主，能戮力建策，反觀漢世士人冒愧逞願，追求私人榮利而德性污損。作者貶抑當世此輩士人的行為，自己則絕不與他們同流合污，而強調道德節操，並且作為個人之歸宿。可見，作品之架構雖仍建立於“世易俗異，事勢舛殊”的體認上，但此時作者之主要關心重點，轉為當前社會充斥的不合理現象及士人價值取舍之問題上，崔寔《答譏》、蔡邕《釋誨》亦如此。

(二) 對時代風氣之批評及尋思自處之道

"對問"體作品,透過時異事異之架構,理性分析當前的時局,而其中對時代風氣的感觸,難免流露出作者的感慨及憂慮,因此,作者進一步探索合理的處世之道,安撫自我情懷,首先看《答客難》中對時代風氣之批評:

△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緩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賢不肖何以異哉"的社會對本質價值之不能分辨,其基因來自於漢室一人專制制度所帶來的流弊,士人之活動,權在君主撥弄之下,因而只好走修身之路,"苟能修身,何患不榮!"求自寬自解。大一統專制政治對知識份子的壓力,始終未解,但隨時間的經過,漸次習以為常,揚雄《解嘲》以後之作品,對時代之批判,主要針對現實政治的風氣與士人之理想之不相應層面,如:

△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言其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揚雄《解嘲》)

△及津者風櫓,失塗者幽僻。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張衡《應問》)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攫處。……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崔駰《達旨》)

△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誇者死權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蔡邕《釋誨》)

如此的政治環境之下,士人各自尋求自處之道,如: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莫,守德之宅。……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揚雄《解嘲》)

△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捨諸?……時暗

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故密爾自於斯文(班固《答賓戲》)

△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慕古人知所序(崔駰《達旨》)

△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沉緝溝壑，棲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優。餘竊巫醜，庶遵厥猷。(崔寔《答譏》)

△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君子推微答著，尋端見緒，……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練於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蔡邕《釋誨》)

儘管作者所處的時代不同，但其自處之道，都皈依高尚的節操，脫離時俗風氣而能維持生命的尊嚴。正如《文心雕龍·雜文》編所言：“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於是“對問”體之“表志”、“抗俗”，莫不“淵岳其心”，而構成其內容特質。

六、结语

的文學類型。文學類型之區分，乃為作者創作與讀者閱讀時共同參照的規範。隨著文學作品的積累，自魏晉以降，探討文體分類的文章，因實際需要而與總集之編撰同步出現。而其分類，意味著某類形式結構及性質相近的作品，其數量已相當可觀。文類之形成，乃為歷史的產物，各文類都有歷史的淵源，自東漢以來，逐漸形成的“對問”類，也被設立為一種文體。此類在結構形式與內容主旨上，固然具有文類共同之特性，但本與賦體性質相近之故，從《文心雕龍》之辨析文字之中，也難辨認其文類之間根本性質的差異。雖然如此，“對問”類作品的獨特風格與六朝文體分類所反映的當時寫作的實際情況，這是《文心雕龍》所以另立“對問”之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 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何沛雄：《賦話六種》，香港，三聯書店，1982年。
- 黃叔琳注：《文心雕龍》，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李乃龍：論《文選》“對問”體，《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 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出版社，1977年。
- 李錫鎮：《兩漢魏晉論體之形成及演變》，臺北：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1年。
- 孫津華：文體學視野中的“對問”、“說論”體，《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 吳曾祺：《涵芬樓文談》，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年。
- 吳訥：《文章辨體·文體明辨序說》，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
- 吳娛：對問體的傳承和異化考辨，《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
- 姚鼐：《古文辭類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Duiwen” Style in 《Wenxindiaolong·Zawen》

Rhie, Jeong-lim

This paper was performed to study of Ask and Answer Style from Wenxindiaolong·Zawen 文心雕龍·雜文 and the process of writing style. About Ask and Answer Style from Wenxindiaolong·Zawen which to express their pent-up feelings through the use of rhetorical expressions,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create consistent streams since Dakenan 答客難 by Dongfangshuo. Ask and Answer Style from Wenxindiaolong·Zawen, which shows that unique style and creative activity since Donghan 東漢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Key words : ask and answer style, wenxindiaolong, shi's intention, lyrical dialog, the source of style

투 고 일 : 2017. 1. 10. / 심 사 일 : 2017. 1. 15.~ 2017. 2. 13. / 게재확정일 : 2017. 2. 20.